

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

——兼谈我国出土的类似器物

李 零(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西辛战国墓是2004年的重大考古发现,其出土物中有两件裂瓣纹银器,格外引人注目^[1]。

2006年12月14日,笔者到青州市博物馆看过这两件文物,青州市博物馆王瑞霞馆长热情接待,并给笔者寄过铭文照片。

2013年11月23日,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郑同修所长安排笔者和冶金史专家苏荣誉先生到青州市博物馆考察,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注意的细节。

这里试做初步讨论。

一 什么叫“裂瓣纹”

裂瓣纹(lobed decoration)是模仿绽放的花朵,或说模仿莲花(lotus),或说模仿玫瑰花(rosette),说莲花有点像(可对比波斯波利斯石刻中波斯、米底贵族手中的莲花),说玫瑰花不太像。其实,这只是一种抽象的花,其构图方式属几何纹饰(geometric pattern),并非状写实物。它以圆面切分为特点,中央是花心,四周是花瓣,花瓣作辐射状。

这种纹饰,起源甚早,传播甚广。它不仅流行于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也流行于希腊、罗马,是西方艺

术的典型纹饰。

裂瓣纹分两种:一种是平面设计,只有花心和一层花瓣,经常用作花边的构图单元(图一),建筑、石刻上用,器物、服饰上也用;另一种专施于器皿,作为整个器物的装饰,花心在器底,花瓣在器腹,好像一朵朝上翻起的花(图二)。因为花瓣具有立体感,好像一道道凸棱,学者或称“凸瓣纹”(fluted decoration)。但“凸瓣纹”专指后者,不能涵盖前者。

裂瓣纹器皿,以金银器最豪华,除了金银器,还有青铜器和玻璃器。

西方的金银器多用一整块金片或银片,利用模具(内模或外模),捶揲而成,有些花纹细部,还辅以篆刻。捶揲是西方金银器工艺的主流,只有某些不便捶揲的器物,才用失腊法铸造。由于器物系捶揲而成,花心内凸外凹,形如肚脐,希腊人称之为 omphalos(肚脐)。花瓣外凸内凹,或作一层,或作两层。如果是两层,往往上下交错。靠近口沿的圆瓣,状若水滴或孔雀翎子上的图案,学者或称“水滴纹”(tear shaped decoration)。但“水滴纹”只是整个纹饰的局部,不能涵盖全体。

笔者以为,就整体而言,这种纹饰还是叫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亚草原考古》资助(项目编号:13JJD780002)。

“裂瓣纹”更好。

中国的纹饰,早期没有这一种。战国秦汉流行柿蒂纹。它有四个花瓣,代表四方,有时在四个大花瓣间再加四个小花瓣,代表八位。如果四方八位加中央,则为九宫图。这种四方八位加中央的构图主要属于方图系统,如嘉祥宋山画像石上的八瓣花就是典型。

中国比西方更偏爱方图,即便圆形的铜镜也是如此。其外郭虽圆,但基本设计,还是四方八位加中央,这和裂瓣纹有本质区别。

中国的莲瓣纹瓦当倒与裂瓣纹相似,但这种纹饰,直至南北朝和唐代才流行^[2]。它与佛教艺术的传入有关,不是中国艺术所固有。

裂瓣纹器皿,学者认为是亚述的创造。这种器物可以向上追溯到很早。中国国家博物馆最近从卢浮宫借展的一批文物,其中有六件埃及托德神庙(Temple of Tod)发现的银器,就是较早的例子。它们制作于叙利亚北部,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要说亚述,也是古亚述时期^[3]。这六件器物都是捶揲而成,四件有纹饰。其中E15160(图三)最典型,已具备裂瓣纹器皿的基本特征;E15168、E15169、E15175是其变形^[4]。

裂瓣纹金银器,鼎盛时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典型器物是下面三件^[5]。

1. 大都会博物馆藏大流士金碗^[6]

编号54.3.1,1954年为Harris Brisbane Dick Fund所获,展于Gallery 405。器腹较深,口沿有三体铭文(古波斯文、巴比伦文、埃兰文),是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前486年)的器物。高11.1厘米,重1100克(图四)。

2.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薛西斯金碗^[7]

编号7985,传出哈马丹。哈马丹即古代的埃克巴坦纳。埃克巴坦纳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四大都城之一。该器口沿有三体铭文(古波斯文、巴比伦文、埃兰文),是薛西斯一世(Xerxes I,前486~前466年)的器物。高11.6、径20.5厘米,重1407克(图五、六)。

3. 不列颠博物馆藏阿尔塔薛西斯银盘^[8]

编号ANE 1994-1-27,据说出土于1935年以前,1994年由不列颠博物馆购入,出土地



图一 波斯波利斯石刻上的裂瓣纹



图二 阿契美尼德裂瓣纹银盘(盖蒂博物馆,68AM,46)



图三 埃及托德神庙出土裂瓣纹银器

点不明。此器口沿有古波斯文铭文,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I,前465~前424年)的器物。高4.7、径29厘米,重803克(图七)。同样的器物还有三件:一件在弗利尔美术馆,一件在大都会

博物馆,一件为伊朗德黑兰 Reza Abassi 藏品。

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裂瓣纹器皿仍流行,即使到了欧洲中世纪,也能见到这种器物,只不过器形由高变矮,由深变浅,纹饰简化,往往只有花心和一层花瓣。

裂瓣纹器皿,深腹者,一般称碗(bowl)或杯(cup);浅腹者,一般称盘(dish)。但其实际用法并不严格。这种器物,西人亦称 phialē,学者或取音译,把它叫做“筐罍”。Phialē 是希腊文,拉丁文作 phiala^[9]。他们的器物,凡与希腊器物相似,往往会采用希腊的叫法,就像我们根据古代礼书和宋代定名给青铜器起名字。这是比较典雅的叫法。

二 西辛大墓的裂瓣纹银豆

西辛大墓出土的银器,一共有五件,都有铭文(见本期《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以下称《简报》)。

这里说的裂瓣纹银豆,学者或称银盒,两种叫法各有所主,都有一定道理。如果称盒,是就它的主体即银制的盒体而言。其实,这种器物是用复合材料和复合工艺制成的,器物主体虽用银片捶揲而成,但盖上加了三纽,器下加了圈足,器纽和圈足系青铜范铸,整体造型类似我国的盖豆。如果称豆,是就整体造型而言。这里统一称豆。

(一)银豆

1. 银豆一 高 11.1、腹径 11.3、底径 5.6 厘



图四 大流士金碗

米,重 375.25 克(见《简报》图四二、四三)。盒体部分是用银片捶揲而成,因受力不均,有些地方太薄,容易造成破损,器壁有很多漏洞和小眼,即属于破损,并非范铸的气眼。此器有子母口,盖器扣合,目前打不开。绕口沿有带饰,作凸弦纹夹阴刻斜纹,系篆刻而成,然后鎏金。口沿上下,器壁饰双层裂瓣,裂瓣两端,一头尖一头圆,圆端朝外,尖端朝内,好像水滴交错。每个花瓣都外凸内凹。从器物内部看,凹坑边缘相接处有约 1 毫米的小边,显然是用凸瓣内模捶揲留下的痕迹,并非范铸。器底为平面,没有西方裂瓣纹器皿常见的脐状花心。盖置三纽,满覆黄色铁锈,估计下面是青铜纽。三纽造型不甚清晰,似为卧姿的虎豹。底接青铜圈足,有鎏金痕迹。圈足内嵌漆木盖,似钤方印,留下边框,但印文不清。器纽、圈足,从器物内部看,没有铆接痕迹,估计是焊接上去的,焊接方式可能类似于南越王墓所出,但器纽为铁锈所掩,外底被漆木盖所掩,除非透视,难以窥知细节。铭文作“叟,一又卅分”,过去未发现,这次见于圈足旁腹壁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漆木盖有三组卷曲的花纹,与下窝托村齐王墓出土 1 号银盘(QK1:65)上的花纹相似。该盘有纪年,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的器物。

2. 银豆二 高 10.6、腹径 11.6、底径 5.8 厘米,重 385.03 克(见《简报》图四四~四六)。此器可打开。器口因挤压而变形,器壁甚薄,破损严重。器形、纹饰和制作工艺同上。圈足内有同样



图五 薛西斯金碗

的漆木盖。圈足旁腹壁上有铭文,同银盒一,也是这次发现的。

(二)同出的银盘、银匣

1. 银盘一 直径 15.8 厘米,残重 75.89 克(见《简报》图四七、四八)。破损严重,口沿脱落,器身残失其半。器底有铭文,作“鬲平,一又卅分”。

2. 银盘二 直径 16.8 厘米,残重 54.69 克(见《简报》图四九、五〇)。破损严重,只剩残片。器底似蒙铁锈,有铭文,同银盘一。

3. 银匣。对角线长 7.3 厘米,残重 19.15 克(见《简报》图五一、五二)。破损严重,只剩两块残片:一件为器底残片,一件似器流,但流口起沿。该器是否为匣,存疑。器底有铭文,作“鬲平,二又卅分”。

这五件器物,两豆同铭,两盘同铭,匣与两盘略同,但重量不同。下面解释一下。

(一)银豆的铭文

“叟”,工师或工匠的私名。此字可能是鬲字的另一种写法,上面省去姓氏。

“一又卅分”,估计是记重。“一”是整数,“卅分”是余数。古代记重铭文常以分数表示余数^[10]。这里的“一”,从重量考虑,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指一斤,“卅分”是一斤的三十分之一。另一种可能,“一”指一镒,“卅分”是一镒的三十分之一。斤、镒是古代常用的记重单位。古代衡制,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向无异说;镒则有二说,一说二十两为镒,一说二十四两为镒。古书记载,齐国既用斤,也用镒。如《管子·山权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战国策·齐策四》“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战国时期,齐国一斤重多少,不清楚。其他国家,学者以出土实物和铭文研究,考得秦、赵一斤约重 253 克,韩、魏一斤约重 252 克,楚国一斤约重 250 克^[11]。今取三数中的最大值,设以 253 克为一斤,一斤的三十分之一为 8.4 克。两数相加,重 261.4 克,大大低于 375.25 克或 385.03 克,可见“一又卅分”不可能是一又三十分之一斤,更大可能是一又三十分之一镒。战国时期的两约重 15.6~15.8 克^[12],今取平均值,以 15.7 克为一两。如果“一又卅



图六 薛西斯金碗(底部)



图七 阿尔塔薛西斯银盘

分”是一又三十分之一镒,有两种可能,一种取二十两为一镒说,“一又卅分”等于 $(15.7 \text{ 克} \times 20) + (15.7 \text{ 克} \times 20 \div 30)$, 约合 324.5 克;一种取二十四两为一镒说,“一又卅分”等于 $(15.7 \text{ 克} \times 24) + (15.7 \text{ 克} \times 24 \div 30)$, 约合 389.36 克。这两个数字,后一数字更接近器物的重量。

齐国的镒到底有多重,这里有一条重要线索。1992~1993 年,临淄商王墓地一号墓(战国墓)出土过两件铜耳杯^[13]:一件(SM1:114-2)较大,左耳铭文作“(私)之十,冢(重)一益(镒)卅八廛”,意思是此器为私官(王后食官)所藏,编号十,重 1 镒 38 廛。另一件(SM1:114-4)较



图八 石寨山 11 号墓出土裂瓣纹铜豆



图九 石寨山 12 号墓出土裂瓣纹铜豆

小,右耳铭文作“少司马子□之𨔵(造)”,左耳铭文作“𨔵(杯),大式益,冢(重)参(三)十𨔵”,两者连读,意思是此器为少司马子某所造之杯,编号“大式益”,重 30 𨔵。𨔵,过去并不认识^[4],现在考虑,应当从尸从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它所从的“自”,写法很古老,仍有甲骨文的笔意(其下卷的笔画是表现鼻孔);下面加“丌”,也与吴越系统的“自”字相似。《说文解字·自部》:“自,鼻也。象鼻形。”鼻、息等字从之。《说文解字·尸部》有𨔵字,许慎的解释是“卧息也”。此字少见,估计是息字的另一种写法。自和从自得声的字多为脂部字,但息是职部字,古音有所分化。此字是𨔵以下的一级,从进制考虑,非锱莫属。锱是庄母之部字,息是心母职部字,古音相近,可通假。锱是铢、两之间的衡制单位。《说文解字·金部》:“锱,六铢也。”这两件耳杯,报告没有报道其重量,承临淄市文物局韩伟东局长告,前器重 517 克,后器重 117 克。今以 24 两为一𨔵(重 376.8 克),6 铢为一锱(重 3.9 克),试做推算,前器 1 𨔵 38 锱,等于 376.8 克+(3.9 克×38),约合 525 克,与实物相校,误差只有 8 克;后器 30 锱,等于 3.9 克×30,约合 117 克,正与实测重量吻合。可见齐国的𨔵是 24 两,锱是 6 铢。

古代度量衡,度所以丈田,量、衡所以计米、钱,皆与食、货有关。研究度量衡,要从这一背景考虑。古代廩食,量、衡并用,而以量为主。

量、衡有换算关系。古人讲衡制,向以积粟为说,出发点是粮食,终结点还是粮食。《汉书·律历志上》:“一龠容千二百粟,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这套衡制,最高一级是石,石是用来称粮食。但古人还有寸金为斤说,则与货币制度有关,如《汉书·食货志下》:“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这种说法也见于汉以来的算术书,如《九章算术·少广》刘徽注:“黄金方寸,重十六两,金丸径寸,重九两。”《孙子算经》卷上:“黄金方寸,重一斤,白银方寸,重一十四两。”

𨔵是斤以上的单位,古书亦作溢。如《仪礼》(《丧服传》、《既夕礼》)、《礼记》(《丧大记》、《间传》)有“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或“朝一溢米,莫(暮)一溢米”说。郑玄有“二十两为溢”和“二十四两为溢”两说,并称与量制换算,等于“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部》以为“过于一斤十六两,故曰溢”。战国一𨔵也叫一金,还与黄金的计算有关,故字从金。《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一黄金一斤”,索隐引臣瓚说,有所谓“秦以一𨔵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说,《史记·燕召公世家》提到“子之因遗苏代百金”,正义引臣瓚说,谓“秦以一𨔵为一金”,又引孟康说,谓“二十四两曰𨔵”。按照这一说法,秦代仍以𨔵为金,汉代才废𨔵用斤,以斤为金。情况是否如此,还有待验证。我们从出土发现

看,秦汉器物都是以斤记重。笔者怀疑,镒在秦代已不大流行。

古代衡制,1两=24铢或6镒,1斤=16两,1小镒=20两,1大镒=24两,1钧=30斤或24小镒或20大镒,1石=120斤或96小镒或80大镒。其进率以四分进制为主,主要是为了便于几何切割,也便于与量制换算。

(二)银盘、银匝的铭文

“𨾏”,齐国姓氏。《姓苑》、《封氏闻见记》、《路史》等书说齐太公之后有绍氏。此字上从邵,下从邑,或即此氏。战国齐文字,邵字的写法很有特点,刀、口不是上下结构,而是左右结构^[15]。这和其他国家的写法完全不同。

“平”也是工师或工匠的私名。平与粤同音,他与银豆制造者或许是同一人。战国齐文字,平字的写法很有特点,不是两横一竖两斜点,而是两横一竖四斜点。这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齐国文字的平字有三种变体:第一种是在第一道横划上加一短横(属于饰笔)、两斜点;第二种是把下面两斜点改成两竖,跟中间一竖平行;第三种是第二种的斜体,竖划扭着写,朝左倾斜,三竖变三撇,有时还省去一撇^[16]。这里的平字就是属于最后一种。

“一又卅分”和“二又卅分”。“一又卅分”见两件银盘,同记重两件银豆。看来,这四件器物是用同样重量的银片制造。但银匝不同,重“二又卅分”,“二又卅分”等于 $(15.7\text{克}\times 48)+(15.7\text{克}\times 24\div 30)$,约合766.16克。

上述银器,从铭文字体看,毫无疑问是战国器物。

三 我国出土的类似器物

我国出土的类似器物还有下面八例,四件铜器,四件银器,今按发现时间排列,撮述如下。

(一)铜器

1. 铜豆一 1956~1957年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家族墓地11号墓(年代在前175~前118年之间)出土,编号M11:6。盖器饰裂瓣纹,盖上有三鸟纽,有子母口,器口无带饰,亦无铭文

(图八)^[17]。

2. 铜豆二 1956~1957年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家族墓地12号墓(年代在前175~前118年之间)出土,编号M12:33。高12.5、口径13.4、腹径14.2、圈足径7厘米,器形、纹饰、工艺与前者相似,盖上有三豹纽,器口无带饰,亦无铭文(图九)^[18]。

3. 铜豆三 1958年冬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家族墓地23号墓(西汉晚期墓)出土。高11厘米^[19]。

4. 铜豆四 1958年冬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家族墓地23号墓(西汉晚期墓)出土。高11厘米^[20]。

这批铜豆发现最早。器物是范铸镀锡。因为范铸,器壁内平,无凹坑,与捶揲而成的银豆不同。镀锡是为了仿银,物美价廉。器表上的白色是锡皮,绿色是锡皮剥落后露出的铜锈。

西汉时期,裂瓣纹银豆多出诸侯王陵。无论皇帝所赐,还是王侯自造,都是高等级的身份象征。滇王是藩王,地位不如汉王,降格以求之,只能以铜代银,但其仿制对象仍是高等级的银豆。中国古代有所谓“五色之金”,许慎以银为“白金”,铅为“青金”,锡为“银铅之间”(《说文解字·金部》)。古人把银、锡视为类似的金属,如铜镜铭文中的“和以银锡清且明”,所谓“银锡”就是锡。锡器制造,在云南很有传统。



图一〇 窝托村齐王墓出土裂瓣纹铜豆



图一一 窝托村齐王墓出土裂瓣纹银豆盖内的铆接痕迹



图一二 窝托村齐王墓出土裂瓣纹银豆器底铭文

(二) 银器

1. 银豆一 1978~1980年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第二代齐王刘襄之墓)随葬坑一号坑(QK1)出土^[21],编号QK1:72。高11、口径11.4厘米,重570克(图一〇)。这件银豆,与西辛银豆比较,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剖面呈椭圆形,而不是圆弧形;第二,兽纽、

圈足是铆接,而不是焊接(图一一);第三,无器口带饰。铭文在器腹内底和圈足旁腹壁上,两处均作“南木”(图一二)。参考同出器物的铭文(数量很大),可知“南”是“齐大官南官”的简称。“齐大官”是齐王的食官,“南官”是置用之所,“木”是工师或工匠名。

同出银器,还有银盘三件,均有铭文。I式盘,只有一件(QK1:65),铭文分两种,一种在口沿底下,以“卅三年”开头,学者分析,这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的铭文;一种在外底,系汉代加刻,可见此盘是西汉墓中的秦器,年代比墓葬早。II式盘,两件(QK1:71-1和QK1:71-2),均有“南木”铭文,与银豆为同一人所作,可见豆与II式盘是一组,而与I式盘不同组^[22]。

2. 银豆二 1983年广州市象岗西汉南越王墓(第二代南越王赵昧之墓)主棺室足箱内出土^[23],编号D2。高12.1、口径13厘米,重572.6克(包括盖重243.8克在内)(图一三、一四)。此器器壁光滑,大体完好,唯器壁一侧留下若干小洞。器形酷似西辛银豆,只有两点不同:第一,它有圈足,但无三纽,虽然做好焊点,但没安装;第二,它的鎏金带饰,弦纹中间是麦穗纹,西辛银豆是斜纹,斜纹相当麦穗纹的一半。此器缺三纽,美中不足,但对了解西辛银豆的制造工艺反而很有帮助。上文说,西辛银豆的器纽可能是焊接,但怎么焊接并不知道,此器是最好的参考。报告说,“器底附加铜圈足座。座鎏金,锈蚀严重,仅存2/3,与器身脱离。圈足座与器底之接合方法颇为特异:先在银盒外底的正中间,用银焊固定一个圆柱状的凸榫,铜圈足另铸,圈足内塞入一块木板(尚有朽木),板中凿一个小孔,借此把铜圈足固定”,情况似与西辛银豆相同。此器有铭文。盖铭分三组,焊点一标“一”,旁有“一斤四两,右游一,私官,容三升大半”;焊点二标“二”,旁有形似“又”的符号和“名甘百卅一”;焊点三标“三”,旁有“三”字。器铭在外底,与盖铭大同小异,但被刮削,有些字已看不清。铭文分刻两处:一处作“名甘”,下文残缺,从显微摄影的放大照片看,似乎是“百卅一”等字;一处作“之(?)三。私官,

容”，下文残缺，估计是“三升大半”。“一斤四两”是记重量；“右游一”是以离宫别馆名加编号，“右游”是器物的置用之所；“私官”是皇后食官；“容三升大半”是记容量，意思是三又三分之二升^[24]。“名甘百卅一”是甘字第一百四十一号，“名某”加序号，是汉代器物编号的惯用格式^[25]。“一斤四两”，以西汉一斤合 248 克、一两合 15.5 克折算，约合 310 克。这个重量是盖器各自的重量，原来的器重是 620 克，现在少了 47.4 克，也许是待配三纽的重量。我们若以盖重 243.8 克加 47.4 克，其和为 291.2 克，这个数字倒是接近 310 克。

3. 银豆三 1997 年巢湖市北头山 1 号墓（曲阳君胤之墓，曲阳君可能是当地的最高的长官）北边箱出土，编号 BM1：22^[26]。高 11.4、口径 11.2 厘米（图一五）。此器也是半成品，不但三纽阙如，而且连焊点也未做，器口带饰未鎏金，只有一条斜纹，没有上下的弦纹。此器之盖、器皆有铭。盖铭在盖顶，作“十三两十二朱（铢）”。器铭在外底，作“□□两十二朱（铢），二朱，十两□朱（铢）旱”。器物重量可能是 13 两 12 铢加 10 两若干铢，总重量为 23 两 12 铢以上，约合 364 克。此器实测重量：盒盖重 192 克，盒身重 328 克，铅座重 69 克。

同出银器，还有盘 1、匜 2、洗 1（应改称盂），除洗外，余皆有铭文。

4. 银豆四 2009~2012 年江苏盱眙县大云山一号墓（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之墓）前室盗洞内出土，编号 M1K1⑥：661^[27]。高 12.1、口径 13.2 厘米（图一六、一七）。与银豆二几乎完全相同。

同出银器，有裂瓣纹盘二（图一八）、沐盘一、洗四（应称盂）、匜四^[28]。除洗、匜，其他皆有汉代铭文。

这批器物，对研究西辛银豆是重要参考。

四 总 结

西辛银豆是中国年代较早的银器。银器在中国出现较晚，不但晚于青铜器，也晚于金器。

中国冶金史，“冶金”的“金”是金属的统称，



图一三 南越王墓出土裂瓣纹银豆



图一四 南越王墓出土裂瓣纹银豆（底部）



图一五 北头山 1 号墓出土裂瓣纹银豆



图一六 大云山汉墓出土裂瓣纹银豆



图一七 大云山汉墓出土裂瓣纹银豆(俯视)

不仅包括铜、铁、铅、锡,也包括黄金和白银,但商代、西周,“金”主要指青铜,黄金的重要性并不突出,白银几乎没有。

中国冶金术的发明离不开火的使用、石器制造提供的矿物学知识以及陶器制造对块范分铸法的启示。这三大前提皆以新石器考古为背景,中西方并无不同,但为什么中国的金属工艺,青铜冶铸一枝独秀,以至掩盖了其他金属工艺,如金银器、捶揲工艺和失腊法?只有通过对比,才能提供线索。

金银是贵金属,它们和“宝物”(treasure)的概念分不开。“宝物”,人见人爱,但中国对“宝物”的理解跟西方大不一样。中国所谓“金石”,金中最爱青铜(bronze),石中最爱玉(jade),特别是软玉(nephrite)。中国的宝字,从玉从贝,我们理解的“宝”主要是宝贝和软玉。而西方更爱黄金、白银和钻石等。虽然,中西文化存在差异,但两种偏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通过长时间、远距离、一站接一站的交流,最终还是走到一块儿。

众所周知,早在二里头时期,金器就已出现在宁夏;到了商代、西周,在内蒙古和与内蒙古邻近的北京、陕西、甘肃、宁夏以及四川,都有零星发现。这些发现多属小件饰品,出土地点多在边疆。

金器,真正属于容器,要到春秋、战国之际才突然出现,比近东晚得多。有两个较早的例子:

绍兴306号墓出土的金钶(春秋末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盞和金杯(战国初年)^[29]。这三件金器都是南方的东西。

银器,真正属于容器,出现更晚,大约要到战国中期,特别是战国晚期。

中国的金银器和欧亚草原是什么关系,和中亚、近东是什么关系,是一个值得长期探讨的问题。裂瓣纹银盒的出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线索。

上述十器涉及很多方面,这里试作归纳。

1. 出土。上述器物分别出于晋宁、广州、盱

胎、巢湖、临淄、青州。这六个地点,从南到北,全是靠海或离海较近的地方。

2. 年代。上述器物多出西汉墓,过去以为都是西汉器物,但西辛大墓所出有战国铭文,说明战国就有。西辛大墓是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墓葬,其他汉墓多为公元前2世纪的墓葬。窝托村汉墓年代约前179年,北头山一号墓年代约前140年,大云山汉墓年代约前128年,南越王墓年代约前122年。石寨山墓地晚一点,也是西汉时期的墓葬。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大体相当于帕提亚王朝(前247~前224年,我国史料叫安息)。中国与西方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历史上有两大高潮,这是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是魏晋隋唐,中国与萨珊、粟特的来往)。

3. 尺度。高度约10.6~12.5厘米,口径约在11.2~14.2厘米,只有一握大小。它们当中,西辛银豆最小,石寨山铜豆最大。

4. 重量。各器重量不一,六件银器,有些残损,有些是半成品,西辛所出最轻,残重只有375.25克和385.03克,据铭文推算,估计近400克。窝托村所出完器,重570克。南越王墓,所出重572.6克,如果配上器纽,估计在620克左右。北头山所出,重589克。

5. 容量。缺乏实测数据,只有南越王墓所出,铭文记容,作“容三升大半”。

6. 材质。以白银、青铜为主,并以金、锡、木为辅料。

7. 工艺。盒体用银片捶揲,盖纽、圈足用青铜范铸,并辅以錾刻、焊接、铆接、鎏金和镀锡,集多种工艺于一身。

8. 风格。这类器物是带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但经中国式改造。盒体饰裂瓣纹,属西方风格。盖置三纽,底配圈足,属中国风格。

9. 铭文。属物勒工名,内容可能涉及五项:置用之所、职司官署、工师工匠、器物编号和容量重量,但每件器物只有其中一项或几项。

10. 功能。不详。只有南越王墓所出,内盛黑色丸状物,未经化验,报告推测是药丸。

11. 组合。同出银器,主要是盘、匜以及习

惯上称为洗的盂,还有耳杯。它们,除了盘,一般比较小。

12. 定名。学者或称豆,或称盒。中国铜器,战国以来流行三纽盖,鼎、簋、豆都用这种盖,鼎无圈足,簋有耳,可以排除,称豆最符合中国概念。

这批器物是哪里制造,学界有两种看法^[30]。一种看法,器物是外国制造,经海路或陆路传入;另一种看法,器物是本地铸造,完全是中国人的作品。前说以孙机先生为代表^[31],后说以尼克鲁(Lukas Nickel)教授为代表^[32]。

孙机先生主外来说,着眼点是器物的艺术风格和制造工艺。他认为,这类器物虽有后配的盖纽和圈足,但银质盒体绝对不是中国的东西,裂瓣纹是外来风格,金银捶揲也是外来工艺。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支持这一观点。

这两条证据,我认为都有一定说服力,特别是第一条。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认为,裂瓣纹是中国传统,捶揲工艺是中国传统。

中国文明不是孤立的文明,外来影响是个长期问题。战国秦汉和魏晋隋唐相比,虽然不如后者,外来影响更突出,但仔细分辨,当可感受,前者也大有胡风。金银器的出现是一个观察点,捶揲工艺的出现也是一个观察点。

中国早期艺术的外来风格往往不是直接传入,而是接力式传播。比如西域各国、南海诸



图一八 大云山汉墓出土裂瓣纹银盘

国,还有北方草原,都可能是输入孔道。输入者,既可能是样品,也可能是设计,甚至是工匠(把外国工匠请进来,把本国工匠派出去)。我们若以外销瓷的历史做对比,情况会更复杂。任何外来风格,一旦受到欢迎,马上就会引起仿效,买方可以照单定做,卖方可以投其所好。有仿造就有改造。风格也好,工艺也好,都可能是“四不像”,就像洛可可风格(Rococo style)中的中国情调。汉代的诸侯王陵,特别喜欢异国情调,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比如南越王墓的银豆和玉来通就是这种混合风格的典型^[33]。

尼克鲁教授的本土说,主要来源于两点怀疑,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提出^[34]。

第一,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的出土物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件与此完全相似的器物。

第二,西方的裂瓣纹器皿只有敞口的碗、盘,器物没有盖,更没有子母口上下互相扣合的例子。

另外,还可补充的是,上述裂瓣纹银豆,器底没有脐状突起。

为了证明中国的裂瓣纹银豆纯属中国制造,尼克鲁教授以南越王墓所出为例,提出两条证据:

第一,南越王墓所出,器壁太厚(3毫米),器口剖面呈90°,没有捶揲痕,显然是铸造。

第二,南越王墓所出,器腹有泡状气孔,但器盖光滑,可见不是腐蚀造成,而是范铸不精所致。

他强调的是,此器是铸造,铸造是中国工艺。但他是隔着展柜观察,印象应有问题。2013年12月31日,承南越王墓博物馆李林娜馆长慨允,博物馆打开展柜,我和苏荣誉先生得以目验原器。我们的印象是,此器器壁很薄,所谓泡状气孔,其实是破孔,跟西辛银豆一样,孙机先生说,这件器物是捶揲而成,这个结论并没错。

最后总结一下,笔者的看法如下。

1. 上述十器,石寨山所出是中国仿造,没问题。

2. 六件银器,其盒体部分,不是铸造,而是捶揲。至于是否仿造,还可讨论。问题是既言仿造,必有蓝本,找到蓝本,方知有什么改造,这种蓝本是什么?

3. 这六件银器,无论从境外输入还是在本地仿造,都无碍一个基本前提:器物的主体纹饰是外来风格。这种风格的传入不管多么曲折,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做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见证。

附记:本文在冶金史知识方面得到苏荣誉教授指教,并承他提供部分摄影资料,谨致谢忱。

[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2] 战国秦和秦代有所谓“莲花纹瓦当”,见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第154~155页;图版124、125,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124是五瓣花,图版125是八瓣花。这种纹饰未必就是南北朝时期莲花纹瓦当的前身。特别是后者,可能仍然属于柿蒂纹。

[3] 吕章申主编《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文物精品》,第76~77页;杯子,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

[4] E15160,侈口,小平底,花心在器底,作两道圆圈纹,没有脐状突起;花瓣在器壁,外凹内凸,与后来相反。它的花瓣是垂直排列,与后来的裂瓣纹最相似。E15169、E15175的花瓣作螺旋排列,是E15160的变形。E15168是另一种纹饰,变化更大。

[5] John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112-20.

[6] Charles K. Wilkinson, 1955. "Assyrian and Persian Art,"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13(7), p.224. Prudence O. Harper, et al. 1984. "Ancient Near Eastern Ar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41(4), Spring 1984, p.52, fig.72. Michael J. Vickers, 1984. "Darius' gold phiale (Lysias 19.25-6),"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9, fig. III B, note 18.

[7] 同[5], pl.97.

[8] 同[5], pl.103. 案:有人对它的铭文有怀疑。

[9] 14世纪以来,英语有 phial 一词,就是从这个词

- 演变而来,但含义发生变化,多指装药水的小玻璃瓶。
- [10] 二分、三分、四分、六分、八分、半、大半、少半等。参见丘光明《试论战国衡制》,《考古》1982年第5期。
- [11] 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第282~347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
- [12] 据考,魏国一镒约重315克,以20两为镒,每两合15.75克。参见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第321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
- [13] 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商王墓地》,器形见第24页图版一八:3,线图见第27页;图一七,齐鲁书社,1997年。
- [14] 报告不释,孙刚释展,见《齐文字编》,第23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案:此字曾见于端方旧藏的一件耳杯,铭文作“冢十六廩”,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六册,5227页;09940,编者释读,中华书局,2007年。
- [15] 参见孙刚《齐文字编》,第246页;第4字(从邵从支);第336页;第3字(从邵从系);第366页;第6字(从邵从金),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 [16] 同[15],第123页;第1字。
- [17]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器形见第69页,图版肆叁:4,插图二一: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石寨山》,第38页;图22,文物出版社,2009年。
- [18]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69页,器形见图版肆叁:5,文物出版社,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云南文明之光——滇王国文物精品集》,第1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9] 马德娴《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记》,《考古》1959年第3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张增祺《晋宁石寨山》,第38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案:《简记》提到“圆银盒1件,盒内装有五铢钱1枚”,据《简报》实为铜盒两件。张书说“其他两件器形及花瓣纹相同,唯盖顶无立体动物雕饰”。
- [2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晋宁石寨山》,3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 [21]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器形见第258页;图二九,5;图版拾肆,3);齐国历史博物馆《临淄文物集粹》,第58页,齐鲁书社,2002年。
- [22] 此墓铜器、银器多有铭文。据铭文,器物多属齐大官北宫和南宫所置。木,除见于这套银器,还见于铜器中的鼎(1:90)、盆(1:50)和勺(1:64-3)。
- [2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文字描述见上册第209~210、312页;线图见第209页;图一三八;照片见下册彩版二二,1和图版一二二,1。
- [24] 报告说,“‘半’字之后的文字已为焊接纽座时熔流的银液所覆盖”(第216页),其实“大半”即“大半升”,不一定还有缺字。
- [25] “名廿百卅一”,汉器铭例,常以名某加数字表示器物编号。“廿”,报告既释曰(第210页),又释廿(第312页)。
- [2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文字描述见第105~107页;线图见第106页;图七六,1;照片见彩版四八,3、4。
- [27]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裂瓣纹银豆,线图见第44页;图七二,3;铭文摹本见第45页;图七三,1、3、4。
- [28] 同[27],线图见第44页;图七二,1、2、4~9;铭文摹本图第45页;图七三,2、5、6。
- [29] 金钺,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器形见图版五,1和第23页;图31)。金盏,见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上册,第390页(器形见上册,第391页;图二四二,下册,彩版一七,图版一四七,1、2)。金杯,见《曾侯乙墓》,第390页(器形见上册,第392页;图二四三,2;下册,彩版一八,1;图版一四七,3、4)。
- [30] 赵德云对有关讨论有综述。参看氏著《凸瓣纹银、铜盒三题》,《文物》2007年第7期。
- [31] 孙机《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收入氏著《中国圣火》,第139~15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 [32] Lukas Nickel, The Nanyue Silver Box, *Arts of Asia*, 42(3), pp.98-107.
- [33] 南越王墓是个各种艺术风格的陈列馆,汉式、越式、草原风格(饰牌)、西亚风格(银豆和玉来通),应有尽有。
- [34] 赵德云《凸瓣纹银、铜盒三题》,《文物》2007年第7期。

(责任编辑:杨冠华)

On the Silver Multi-lobed Dou-Stemmed Bowl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the Warring-States Period at Xixin—Also on the Similar Artifacts Unearthed in China

Li Ling

The silver multi-lobed dou-stemmed bowl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the Warring-States Period at Xixin is an early silverware in China. Silverwares appeared in China rather late, not only later than bronzes but also later than gold wares. As early as in the Erlitou Period, gold objects have emerged in present-day Ningxia. As for the real gold vessels, they emerged suddenly around the transitional time between the Spring-and-Autumn and Warring-States Periods, which was much later than that of the Near East. The real silver vessel emerged, even much later, at the mid Warring-States Period, or late Warring-States. Among the metalwork techniques of China, bronze casting is the unique one and so developed that other metalwork techniques, such as gold and silverwork, hammering(*repoussé*) and lost-wax (*cire perdue*), were overwhelmed. On this point, the views of the people in China and the West were different; in the so-called “treasures” in China, the favorite metal was bronze and the favorite non-metals were cowry and nephrite. These were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e view of the Western people, whose favorites were gold, silver and gemstones. It has been an issue worthy of further discussion and exploration that what relationships 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had with the Eurasia Steppes, the Central Asia and the Near East; the discovery of the silver multi-lobed dou-stemmed bowl is a valuable clue.

(上接第96页)

附记:课题组成员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北方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及北京科达诚业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本项研究得到了国家文物局资助,山西省文物局、运城市文物局和万荣县文物局予以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 [1] 柴泽俊《平阳地区古代戏台研究》注5,《柴泽俊古建筑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五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下),第1087页,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曹书杰《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第40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2] 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第136页,中华书局,2006年。
- [3] 形制断代研究参见徐新云《临汾、运城地区的宋金元寺庙建筑》,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建筑材料研究参见彭明浩《山西南部早期建筑大木作选材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 [4] 徐怡涛、任毅敏《仅存的北宋庑殿顶建筑——山西万荣稷王庙大殿》,《中国文物报》2011年7月15日。
- [5] 笔者认为:运城地区与陕西、河南隔黄河相望,历史上与陕西关中地区和河南洛阳、开封等唐宋的文明中心区存在便捷的交通联系,长期受唐宋文化中心的影响,以此反推,稷王庙大殿所表现出的一些符合《营造法式》性质的特点,实际上是《营造法式》与稷王庙大殿共同受唐宋文化中心区建筑形制影响的反映。
- [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平顺回龙寺大殿测绘调研报告》,《文物》2003年第4期。
- [7] 宋末斗拱形制不对称的现象可参见徐怡涛、苏林《山西长子慈林镇布村玉皇庙》,《文物》2009年第6期。
- [8] 徐怡涛《文物建筑形制年代学研究原理与单体建筑断代方法》,《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 [9] 同[8]。
- [10] 徐新云《临汾、运城地区的宋金元寺庙建筑》,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责任编辑:戴茜)

文物

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

2004年4~1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青州市博物馆联合对西辛大墓进行了发掘。该墓是迄今山东地区发掘同类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圻呈阶梯状内收,石椁以巨石垒砌,在石椁之外二层台上分布五座陪葬坑。随葬器物有陶、铜、玉、骨、金、银、漆木器等。从墓葬规模及所处地望分析,墓主的身份可能是齐国的贵族或与齐王室成员有关。该墓修筑考究。从墓壁的加工规整、墓室填土方格网状的夯筑方式,到以加工规整的石块砌成的巨大石椁和以铁汁灌缝的现象等,都是同期墓葬中极为罕见的现象。这为进一步研究齐国墓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发掘简报

1965年11~12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白马村明代失考墓神道石刻后部抢救性发掘了一座砖室墓。出土墓志表明,墓主为明代开国功臣、卒赠皖国公的安庆侯仇成。2012年底至2013年初,南京市博物馆对仇成墓的发掘资料进行了整理,并对现存神道石刻进行了调查测绘。该墓神道石刻尚存石马与控马官、石羊、石虎各一对以及神道左侧的石武士,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出土器物有瓷梅瓶、玉带、鎏金银束发冠、金冥钱等。该墓的发掘为明代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

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兼谈我国出土的类似器物

西辛裂瓣纹银豆是中国年代较早的银器。银器在中国出现较晚,晚于青铜器和金器。金器,真正属于容器,要到春秋战国之际,比近东晚得多。银器,真正属于容器,要到战国中期,特别是战国晚期。中国的青铜冶铸一枝独秀,以致掩盖了其他金属工艺。这一点中西方存在差异。中国所谓“金石”,金中最爱青铜,石中最爱软玉。中国理解的“宝”主要是宝贝和软玉,这和西方理解的“宝物”大不一样。他们更爱黄金、白银和宝石。中国的金银器和欧亚草原、中亚、近东是什么关系,值得长期探讨。裂瓣纹银豆的出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线索。